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程光炜 主编

当代文学的 『历史化』

程光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文学的“历史化”/程光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5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8882-8

I. ①当… II. ①程…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研究
IV. ①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6495 号

书 名:当代文学的“历史化”

著作责任者:程光炜 著

责任编辑:张雅秋

封面设计: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882-8/I·2341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965mm×1300mm 16 开本 16 印张 223 千字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代文学史研究丛书”总序

从1949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算起,中国当代文学的建史和研究,已经足足60年。在中国历史上,这60年是社会最为动荡又充满历史机遇的一个年代。但放在一百七十多年来的视野里,人们并不会为它离奇、剧烈、丰富的故事而惊诧。“当代文学”就发生在我们共同记忆的这一历史时段中。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我们无法无视历史的存在将文学看做一个“纯文学”的现象,我们也无法摆脱文学与历史的无数纠缠,将作为研究者的自己置身事外。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懂得中国当代文学学科为何迄今为止都没有像中国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那样建立学术的自足性、规范性,反而屡屡地被人误解和贬低。更容易看清楚的是,如果当代史观到今天还没有在幅员辽阔的大地上成为一种“社会共识”,那它势必会不断动摇与该史观息息相关的当代文学史的思想基础和学科基础。

当代文学史学科自律性一直缺乏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下限始终无法确定。2000年后至今,当代作家的大量新作有如每年夏季长江无法控制的洪峰一样奔腾不息,声名显赫的老作家也不肯歇笔,对自己的思想头绪稍作整理,并对历史作更深远的瞭望。对新作的关注,仍然是最热门的事业。这就使当代文学很多从业者不得不放弃寂寞的研究,转入更为丰富多彩的当代文学批评之中。当代文学批评在慷慨为文学史研究提供新鲜视角和信息的同时,也在那里蹂躏涂抹着“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的界限。著名作家的新作,还会冲刷、改写和颠覆当代文学以往历史的价值,“超越”依然是当代文学批评最动人的词汇,正是它造成了当代文学观念的不断的撕裂。这种情况下,当代文学的标准和研究规范经常被挪动,也就不难理解。

本丛书提倡从切实材料出发,以具体问题为对象,对当代文学史的“史观”展开讨论,据此观察中国当代文学史为什么会以这种方式展开,影响文学思潮、流派、文学批评和作家创作的历史因素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们就能逐渐知道,它的研究在中国学术环境中失败的症结之所在。

本丛书主张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认为先划出一定历史研究范围,如“17 年文学”、“80 年代文学”等等也许是有必要的,它会有利于研究问题的分层、凝聚和逐步的展开。对具体历史的研究,可能比宏篇大论更有益于问题的细致洞察,强化研究者对自身问题的反省,所谓的历史化也只能这样进行。

本丛书不收文学批评论集,而专以文学史研究为特色。丛书作者以国内一线学者为主,但不排斥年轻新秀优秀著作的加入,更欢迎海外学者的加盟。既为文学史研究丛书,自然希望研究者以经过沉淀的、深思熟虑的文学现象为对象,不做简单和草率的判断;它强调充分尊重已有的成果,希望丛书的风格具有包容性,也主张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对不同于自己观点的研究拥有包容性。

本丛书是对 60 年来当代文学史研究多次努力的又一次开始,这是一项长期和耐心的工作。它并不奢望自己的出版能改变什么,但也相信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前途并不糟糕。

程光炜

2011 年 3 月 2 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编 文学史哲学

第一章 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

——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并论对

- “80年代”的认识问题 (3)
- 一、“出国名人”精神和知识上的优越感 (4)
- 二、“历史回叙”中的“文学想象” (7)
- 三、客厅、咖啡馆和“当事人”身份 (9)
- 四、“插图”正在融入80年代的“历史建构” (13)

第二章 我们如何整理历史

——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着的问题 (20)

- 一、被安装的“新启蒙编码” (21)
- 二、“现代文学”生产的“当代文学” (25)
- 三、与“再解读”联姻的“十七年” (28)
- 四、整理包含着对研究历史的知识的整理 (32)
- 五、整理同时包括了对研究者自己的整理 (36)

第三章 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 (41)

- 一、问题的由来 (41)
- 二、80年代文学的“现代化想象” (45)
- 三、被遗忘的“十七年”文学资源 (50)
- 四、80年代与“十七年”的关系 (54)
- 五、再回到对80年代“现代化想象”的检讨之中 (58)

六、重回“十七年”的一些问题	(61)
七、怎么来理解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	(65)
第四章 重访 80 年代的“五四”	
——兼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下性”问题	(70)
一、“五四”与“文化专制”	(71)
二、“五四”与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	(73)
三、80 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下性”	(77)
四、“现代文学”已经变成了“古代文学”	(80)
五、“年鉴派”命运与重提“当下性”	(83)

第二编 文学史的社会学

第五章 80 年代文学研究的“文学社会学”	(91)
一、80 年代文学中的“社会学空间”	(93)
二、文学“社会学研究”的外部环境	(97)
三、文学思潮的“社会学内涵”	(102)
四、“文学社会学”的两个层面	(108)
第六章 文学研究的“参照性”问题	(114)
一、在被批评的情境中看文学现象	(114)
二、知青小说是如何寻根的	(118)
三、80 年代初文学的“儿童叙述者”形象	(122)
四、对“不喜欢”和“喜欢”的问题的理解	(126)

第三编 被生产的文学史

第七章 《中国现代小说史》与 80 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	(131)
一、《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来龙去脉	(131)
二、西方视角中的“左翼中国”	(134)

三、以新批评为知识原点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141)
四、普实克、夏志清之争中的“世界向度”	(145)
五、如何进入“80 年代”	(150)
六、“重写文学史”与《中国现代小说史》	(155)
第八章 《文学理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	(162)
一、“文学史研究”的兴起	(162)
二、对资料、文献和版本的重视	(166)
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	(171)
四、从《文学理论》看二十多年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 ...	(175)
第九章 从夏氏兄弟到李欧梵、王德威	
——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与现当代文学	(182)
一、从夏济安、台湾大学到美国	(182)
二、“纯文学”立场、排斥左翼与“感时忧国”精神	(188)
三、晚清与“五四”之歧路	(193)
四、从美国到中国：文学史挪借及其他	(198)
第十章 “再解读”思潮与历史转型	
——以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	
等一批著作作为话题	(203)
一、“再解读”思潮与苏联东欧事变	(204)
二、内地学者和留学生的身份转型	(208)
三、“再解读”与西方后现代主义	(214)
四、知识、“历史化”和归还给历史	(219)
文学、历史和方法	
——程光炜访谈录	(225)
后 记	(247)

第一编

文学史哲学

第一章 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

——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并论对“80年代”的认识问题

2005年6月,“海归”文化人查建英女士采访并编选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一书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立即在知识界热销,并登上包括三联韬奋书店在内北京各大书店的“本月销售排行榜”。尽管编者声称:“这本书虽然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往事,却并不是一个怀旧项目。”^①但事实上,阿城、北岛、陈丹青、陈平原、崔健、甘阳、李陀、栗宪庭、林旭东、刘索拉、田壮壮等11位被访者讲述历史的角度、材料剪裁和实际效果仍有相当浓厚的“怀旧”色彩。“中国人的经济生活这十几年来一直处在令人眩晕的急速变化之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接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真清理‘过去’?”“我讲这一番‘以史为鉴’的常识大道理,倒不是暗示八十年代已经成了无人理会的孤魂野鬼,恰恰相反,近年每每在饭桌旁、朋友间听到有关那个年代种种人事的即兴回忆,而且永远伴随着生动的细节和风趣的评论。至少在过来人当中,大家并没有忘掉那段历史。”“历史学家不是说过吗,没有被叙述的历史不能算历史。”^②被访者是小说、诗歌、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名人”,除崔健、陈平原等外,大多数人还有长期待在欧美或香港,或有“海归”经历。这段话采取的历史回叙视角,包含着文学想象的成分,并尽力凸显自己和被访者在“历史”之中的“当事人”(或见证人)身份,这或许是我们进入问题的一个角度。

① 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写在前面》,第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5月。

② 同上。

一、“出国名人”精神和知识上的优越感

最近几年,在知识界和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掀起了一股“归国热”,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潮流中若隐若现的“精神贵族”现象。作为 80 年代文化名人,他们经过欧风美雨和知识洗礼,身份和眼光中无疑有欧美知识界的垄断权和高端想象,再加上国内名校硕士、博士生的热烈围堵,这种“历史反省”便产生了一种难以自控的“优越感”。“优越感”形成了这本书的鲜明叙述特色。阿城说:“‘寻根’是韩少功的贡献,我只是对知识构成和文化结构有兴趣。”“我的文化构成让我知道根是什么,我不要寻。韩少功有点像突然发现一个新东西”,而“我知道这个根已经断了。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已经消失了半个世纪了,原因是产生并且保持中国文化的土壤已经被铲除了。中国文化的事情是中国农业中产阶级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地主、富农、上中农,这些人有财力,就供自己的孩子念书,科举,中了就经济和政治大翻身。”“艺术啊文化啊什么的是奢侈的事情,不是阿 Q 那种人能够承担的。结果狂风暴雨式的土地改革是什么意思?就是扫清这种土壤。”在他看来,“文化构成”就是“常识”、“最基本的信用”,例如:“你知道在美国经常碰到有人来问:要帮忙吗?这个中国原来就有,‘要搭把手?’”“到‘文革’,尤其是到现在,没有了”,“搞来搞去半个世纪了,我们还没到起点!”^①

作为“寻根小说”主将之一,韩少功也是“80 年代文学”的重要“当事人”。但是在阿城对那段文学的历史回叙中,他变成了一个知识和眼光都很“狭窄”的小说理论家。这是由于,他没有从 20 世纪中国下半叶的“文化构成”上思考“寻根小说”的问题,他不知道“根已经断了”,还在那里提倡什么“思想启蒙”。虽然对熟悉 20 年前就在中国内地出版过《中国意识的危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华裔美籍著

^① 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阿城》,第 33、50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 5 月。

名学者林毓生等人来说,阿城此说并不新鲜,林毓生正是以“反省五四”为基点来重审 20 世纪中国文化中的激进主义思潮和诸多负面影响的,^①然而此说转移到“80 年代访谈”这一历史平台,显然又成为“新论”,而且对“狭窄”的“80 年代新潮文论”构成了有力压制。它还由于,这是以西方“优等语境”为根据,以“出国效应”为预设的对“80 年代文学”的“再批评”,那么对于事实上缺乏 80 年代文学记忆和知识构成的年轻一代阅读者来说,这种回叙不光客观上阻断了他们对前者的“重返”,而且造成的印象可能是,“80 年代文学”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文学历史。

北岛是近年来一位因“传闻”、“轶事”急剧添加而致使“个人故事”日益膨胀和丰富的文化名人,《北岛诗选》、《失败之书》等上市后未因作者诗歌写作水平下降受到影响,反而在读者中持续热销就证明“传闻效应”的感知并非空穴来风。在这本书中,“北岛访谈”可能是“新意”最少、与他许多回忆文章重叠最多的一个部分。但即使如此,强调自己作为当代诗歌“前辈作者”和新时期文学“启发者”的叙述风格仍然贯穿始终:“现在看来,小说在《今天》虽是弱项,但无疑也是开风气之先的。只要看看当时的‘伤痕文学’就知道了,那时中国的小说处在一个多么低的水平上。”所以,“80 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小说’,在精神血缘上和《今天》一脉相承。”它还孕育出美术品种:“除了《今天》的人,来往最多的还是‘星星画会’的朋友。‘星星画会’是从《今天》派生出来的美术团体。另外,还有摄影家团体‘四月影会’等,再加上电影学院的哥儿们(后来被称为‘第五代’)。陈凯歌不仅参加我们的朗诵会,还化名在《今天》上发表小说。有这么一种说法‘诗歌扎的

① 华裔美籍学者林毓生的著作《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一部论文集,其中多篇文章涉及对“五四”的“清理”和“反思”。例如他认为,“五四”那种彻底否定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在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任何其他国家都未曾发生过。此种激烈思想的本身又连带产生了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由于极端的反传统导致对西方文化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新的态度、新的看法,这种新的看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教育思想文化政策一直到今天。”这种见解,对阿城应该有很大的启发。参见该书第 231 页,北京三联书店,1988 年 12 月。

根,小说结的果,电影开得花’,我看是有道理的。”他认为,“诗歌在中国现代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就是地下文学和《今天》。”某种意义上正是前者“启发”了“80年代文学”。“80年代就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此后可能要等很多年才会出现这样的高潮。”^①

北岛的观点并非没有根据,《今天》及其诗人创作对80年代文学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他的看法与阿城可能不同,如果说阿城是通过80年代的“狭窄化”来获取领导这一思潮的“当事人”身份的话,那么北岛则将这种身份更明确地定义为“少数人”。在他看来,正是《今天》杂志的“少数人”启发了80年代的“多数人”,才真正启动了“很多年才会出现”的“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化高潮”。出国多年,北岛很多方面都可能变化了,例如喜欢到外国大学“讲学”、到处“演讲”等等,但唯一没变的是他对“时代先觉者”身份的不断维护与反复强调。而在出国之前,人们并没有发现他有这种外在强烈却内在脆弱的“自我建构”意识。针对有些人把“历史活动”看成是“个人发明”的现象,韦勒克曾警告说:“这种极端的‘个人人格至上论’(personalism)必然会导致一种观点,即认为每一部个别的艺术品都是完全孤立的,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它是既无法交流也无法让人理解的。我们必须相反地把文学视作一个包含着作品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变化的整体它在不断地增长着。”^②也就是说,北岛也许无意但事实效果却是把“少数人”建构在了“多数人”之上,把《今天》建构在“80年代”之上,从而简化、牺牲并可能会使人逐步遗忘“80年代文学”实际是一个“作品的完整体系”,“这个体系随着新作品的加入不断改变着它的各种关系”;这种不断改变的“各种关系”,恰恰会激发我们对“80年代文学”历史认识的不断变化并引发

① 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北岛》,第74、75、78、80、81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5月。

②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294页,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

“重读”、“重返”的热情。而北岛的“固定化”工作，一定意义上就在“重返”过程中设置了障碍和阻力，因为它可能会把“80年代”想象成仅仅受到少数“启蒙者”启发才会这样的一个“唯一性”的历史结果。

二、“历史回叙”中的“文学想象”

“当事人”身份中既有“启蒙者”的成分，同样就会包含“文学想象”成分，这种“文学想象”会把“历史事实”充分地增大、扩展，从而增加神话和诗歌的因素。一般人认为“历史叙述”都是“忠实”于历史原貌的，而“文学想象”往往是小说和诗歌的专利品，但海登·怀特并不赞成这种看法：“历史，无论是描写一个环境，分析一个历史进程，还是讲一个故事，它都是一种话语形式，都具有叙事性。作为叙事，历史与文学和神话一样都具有‘虚构性’。”他指出：“为了赋予对‘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叙事以可理解的发展进程的属性，就仿佛戏剧或小说的表达一样，情节结构就成了历史学家‘阐释’过去的一个必要成分。”^①

《八十年代访谈录》出版于2006年5月，这个“新世纪”的标志与“80年代”相比可能被认为是最没有“文学性”的年代。但它某种意义上却是最具“文学性”的历史时期。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性”基本是由作家、批评家所提供的，那么“新世纪”某些方面的“文学性”却需要商业广告、名人轶事、明星绯闻、历史揭秘、出版营销策略来推动和生产。后者通过“文学想象”带领读者一起“重返历史”，因为大多数人都没见过“80年代”是什么样子，这在无形中会强化和扩大对前者的虚构空间。其中一个最大的秘密，即是尝试着建立一个关于“80年代”的“情节结构”。

甘阳回叙的“80年代”于是就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线索：被政

^① 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第10、82页，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治困扰的“家史”——插队经历——进入北大和社科院精英圈子——编委会组成与分裂。“我父亲是一个大学教师,理工科的”,“他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所以我们家属于成分不好一类”。这种出身背景埋下了“反抗”的因子。它促发了他“下乡”、“供职大庆油田”时对“历史”的严肃思考。他大量阅读《民约论》、《世界通史》、《中国通史》、康德、黑格尔、《当代英雄》、《多余的话》、《奥涅金》等等。他供述:“我‘反动’很早”,“那些一般人思想上到大学经历过的什么‘解冻’,对我都早就过掉了”。这种“先觉意识”,使他捷足先登地进入北京“精英圈子”,并因主编大型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而一举成名,站在了历史高端。“当然最熟的还是北大外哲所的这些人。但是北大外哲所是和当时社科院这些的现代外国哲学室熟悉”,“在那里有像苏国勋、赵越胜、徐友渔、周国平这些人”,另外,就是北大外哲所研究生同学陈嘉映、朱正琳、王伟、王庆节、刘小枫等人。甘阳以总结的语气说:“八十年代有几个特征,一个是经济改革不是当时知识界的 discourse,而且不在人们的头脑里面,没有人谈这个经济改革,觉得是很 boring 的事情。第二点是人文科学为主,第三点是西学为主,绝对是西学。这样当然我们就处在比较特殊的一个位置上。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对社会有实质性的影响,当然我们的书当时对大学生、研究生影响很大,因为整个氛围是人文的氛围,而且人文氛围是以西学为主的氛围。”当有人请他从“知识视野”、“自我定位”、“问题意识”和“学术水平”等方面来评价“编委会”对 80 年代知识界的“影响”时,甘阳很自信地回答:“我觉得评价非常高。第一个很简单,在‘文革’以后很短的时间,而且这些大多数都是从知青上来的,很短的一个时间内确实进入到西方哲学思想史的一个最深刻的问题里面去了,学术走点很高。”^①

如何看待关于 80 年代“历史回叙”和“文学想象”中的“情节结构”

^① 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第 169、185、191、196、222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 5 月。

对于今天读者的意义,我觉得顶为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出身——知青——名校——社会影响这几个词组之间紧密自然的历史关系。这种联系令人想到关于“五四”的历史叙事,对于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来说,那就是“从旧营垒出发”——留学——北大——反封建的历史叙事。每逢历史转折,这些“名人故事”往往都借助文学性的叙述被充分放大,形成社会传播的特殊效应。而2006年的“商品经济”、“大众文化”和“市民社会”也是这样一次历史转折。以“商业性阅读”为焦点的这次历史转折与以神话、诗歌方式来传播“五四”故事一样,都容易增加关于“名人”历史回忆和想象,进而将之曲解、扩大、讹传和戏剧化的比重。同时,也使上述“历史回叙”的市场效果在社会公众中实现它的最大化。人们会由此想到,这是一个理想、浪漫而且绝对并永远都将一去不复返的“80年代”。因此,本书访谈人查建英曾不止一次地用“惋惜”和“无比珍贵”的语气来强化我们这种“可惜”性想象。例如,“你们有没有讨论小组?”“已经对‘文革’幻灭了?”“哎,先别跳到编委会,说一下你在北大念研究生那段的事”,“回顾八十年代的时候,一般认为有三大丛书,你们这个《文化:中国与世界》是一个,金观涛夫妇俩的《走向未来》是一个,然后就是汤一介他们的《中国文化书院》”,“你是指什么东西这么弱?人文精神?在中国?”等等。^①它令人想到,当历史故事因年代久远而磨损、破碎、消失在人们记忆长廊的时候,鲜活的文学想象也许是能够将它的碎片再组合,拼接成另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故事的。

三、客厅、咖啡馆和“当事人”身份

2008年,“改革开放”已经走过整整30年的历程。时间拉长了人

^① 参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甘阳》中查的“提问”和“插话”,第166—24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5月。

们与自己“当年”的历史距离,但是这种久远的陌生感,却令人惊异地强化着人们对自己历史的寻找和认同。反过来说,这种寻找和认同本身也在强化着寻找者作为“历史当事人”的身份。

21 世纪初的北京,已与北岛的“朦胧诗”、阿城的“寻根小说”、崔健的“摇滚”、甘阳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刘索拉的“现代派小说”和田壮壮的电影等所营造的 80 年代文化氛围大大不同。在海淀众多的著名大学里,“学院派”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美术馆东街周边,虽然密布着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国美术馆、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社科院考古所和人艺等闻名全国的文化学术机构,但此地已为乱七八糟的商铺所包围,“红尘滚滚”的时代大环境正在悄悄改写由《读书》所主导的中国知识界的历史。时间已经翻过《八十年代访谈录》“被访者”希望留住的“历史一页”,值得珍惜的东西早已时过境迁。这正是罗兰·巴特在《写作的零度》里宣布的:这是一个以“古典主义语言”为基础和理由的现代诗歌“死去了”的时代。^①

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中关村图书大厦等巨舰型书店庞大“码洋”数字的进逼下,著名的北京三联书店已退缩到美术馆东街的一角,它的少得可怜的“码洋”记录,实际象征着它在今天的文化命运。换句话说,它就像王府井北大街那些孤零零的“文人客厅”或“咖啡馆”,在文化惨淡的年代经营着一份摇摇欲坠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事业。“在《波德莱尔与十九世纪的巴黎》中,本雅明用他特有的飘忽不定的线条勾勒了‘文人’的轮廓。他首先在密谋者策划起义的烟雾弥漫的小酒馆里发现了文人,他把他们一同归入了‘波希米亚人’一类;他们生活动荡不定,由偶然事件所支配,毫无规律可言”,“文人随着‘波希米亚流浪汉’进入了‘游手好闲者’的行列,他们是大城市的产儿。在拥挤不

^① 参见伍鑫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第 456—463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